

《理解当代中国·汉英翻译教程》的“二次开发”：原则与实践¹

程 维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 2023 外语教育研究前沿 (原名《中国外语教育》) (3), 29–34 页

提 要：如何使用和教授《理解当代中国·汉英翻译教程》是不亚于教材编写的重要命题；而教材的使用和教学效果又关系到“三进”工作的成效。本文基于教材编写目的、教材试用期间部分教师反馈的问题，提出教师应准确把握教材的编写意图，并以此为原则进行教材的“二次开发”。同时，教师在教材“二次开发”实践中应处理好教学的因事为制与知识的完整建构、学科内容与教育维度、“教材”与“学材”三组关系。

关键词：教材“二次开发”；时政文献外译；“以我为主，融通中外”

[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6105(2023)03-0029-06

DOI: 10.20083/j.cnki.fleic.2023.03.029

1 引言

“教材的‘二次开发’，主要是指教师和学生 在实施课程过程中，依据课程标准对既定的教材 内容进行适度增删、调整和加工，合理选用和开 发其他教学材料，从而使之更好地适应具体的教 育教学情景和学生的学习需求。”（俞红珍 2005： 9）教师不是教学产品的“搬运工”，而是要根据 教学目的、教学对象特征、具体的教学情景等进 行适度加工，用活教材。

对《理解当代中国·汉英翻译教程》（简称 《汉英翻译教程》）进行“二次开发”，应在把握教 材编写意图的基础上，兼顾教学的因事为制与知 识的完整建构，均衡学科内容与教育维度，推动 “教材”向“学材”创新转化，从而达到更理想的 教学效果。

2 教材的编写意图与教学重点

“理解当代中国”系列教材的课文选自《习近 平谈治国理政》《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 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等 权威文献（译文），具有典型的中国时政文献话 语特征。对于刚接触该教材的外语学习者来说，可 能有这样的困惑：这套教材是否就是外文版的政 治教材？非“原汁原味”的英语学习意义何在？

“理解当代中国”系列教材总序中提到：“一 句话，当代中国高等外语教育必须大力培养理解 当代中国、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新人。”（“理解当 代中国”系列教材编委会 2022：II）结论言简义 丰，即教师不能将该教材简单视作外文版的思政 教材，而是要遵循外语教学规律，通过系统的主

¹ 本文系 2019 年度北京市属高校高水平教师队伍支持计划“长城学者”培养计划项目（项目编号：CIT&TCD20190325）的部分研究成果。

题单元教学,帮助外语类专业学生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理解源于实践又引领实践的原发性理论和知识体系,从而提升其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内容生产和供给能力,让国际社会更好地了解中国、读懂中国。

《汉英翻译教程》所选材料大多来自《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及其英文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多语种版本进教材有助于“推广中国话语的外译标准……推动中国更好走向世界,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理解当代中国”系列教材编委会 2022: Ⅲ)。标准往往意味着规范,它为人们理解事物提供重要的认知框架。徐勇(2018: 22, 26)认为,“事物一旦被定义并被广泛传播,并构成一定的标准,就会规范人们的思维”,“长期以来,社会科学研究的落后,使得对中国政治的定义更多的是被定义,即被他人定义”。李智(2014: 199)更直接指出,“国际话语权的实质是国际定义权”。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西方学术界对民主、自由、公平等人类共同价值把持着定义权,以他们认为合理的命名方式和分析框架去解释他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些概念的界定再通过多渠道传播,对人们的认知产生极大的影响,以至于当中国的发展超出了西方现有理论的解释力时,我们似乎难以用另一种语言准确界定从中国的发展实践中产生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例,张毓强、潘璟玲(2021: 51-52)认为,“(因为)中国现代性发展在底层逻辑上就不同于美国,因此中国国际传播必须建立主体性,不仅要有国际话语权,同时也要有关键词和价值观念”。

从这个意义上讲,《汉英翻译教程》就是帮助学生学习和掌握中外权威翻译专家团队的集体智慧,熟稔国际传播中“以我为主,融通中外”的叙事策略,推动中国创新理论和价值主张的对外表达。

在中译外的视域下,“以我为主”主要指“以中国的政治立场为主,以中国文化为根,以中文含义为纲,以中文风格为本”(杨望平 2018: 32);“融通中外”主要指译者具备一定的受众意识、相应的跨文化沟通能力,能综合运用多种语言手段使译文在目的语语境下达到理想的传播效果。“以我为主”与“融通中外”看似矛盾,实则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整体。“以我为主”是对外话语构建的原则,是破除西方中心主义话语迷思的关键;“融通中外”是对外话语构建的实践路径,是通过组织协调多样化的翻译策略,使本土故事在全球语境下(而不是一家独大的话语格局下)形成跨文化共鸣。二者并非泾渭分明,在时政文献外译时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在使用《汉英翻译教程》时,教师首先应着重引导学生深度学习和掌握来自《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权威读本和译本的关键概念,培养“以我为主”的翻译观。比如,“生态文明”“全人类共同价值”“全过程人民民主”等术语是党的理论在新时代语境下的重大创新,相应的英文表达为 eco-civilization、common values of humanity/shared human values、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虽然鲜见“原汁原味”的英语词汇,但不能简单将其视为饱受诟病的“中式英语”,而是体现重要理论命名权、归属权、阐释权的语码转换¹。这样的语码转换也是对人类语言的丰富和发展。

如果指导学生系统学习和掌握治国理政重要概念及其英译是帮助学生树立“以我为主”的翻译观、为将来从事国际传播打下“内容生产”的基础,那么引导学生熟稔丰富的语言手段,在目标语受众的认知框架下讲清楚概念的生成逻辑,从而增强概念的说服力和共鸣效应,则是帮助学生提升“融通中外”话语能力的关键。话语融通意识体现在教材的诸多应用场景中,如表1所示。

¹ 《朗文语言教学及应用语言学辞典》将语码转换定义为:“说话者或写作者从一种语言或语言变体转用另一种语言或语言变体的现象。”语码转换为交际而生,为多语文化和谐共生而存,在延续文化多样性、促进网络交际、反映时代风貌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王云、胡文洁 2022)

表1 话语融通意识在教材中的体现（示例）

原文	译文
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②而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③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④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97年的实践中得来的，⑤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汉英翻译教程》，第64页）	Chinese socialism did not drop from the sky, but has stemmed from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nearly 70 years of exploration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in 1949. It is the result of the Chinese people's experiences during 97 years of great social revolution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founded in 1921. It is the result of more than 170 years of historical progress since 1840 during which the Chinese nation has evolved from decline to prosperity.（《汉英翻译教程》，第64页）

在以上译例中，原文②—⑤使用了数字的反复修辞，按照时间顺序由近及远层层递进，使语气不断加强。但译文除了考虑到数字反复的修辞形式，还兼顾目标语读者如何理解涉及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改革开放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等有着深厚历史内涵的概念。为此，译文补充了1949、1921、1840三个具体年份，帮助目标语读者明确相应的历史阶段。译者在没有改变原文核心信息、没有增加受众认知负荷的前提下，从受众的接受角度组织语言，体现了较强的文化移情能力。可以看出，优秀的译者犹如造诣深厚的画师，他们善于运用笔墨（语言）的轻重隐显，选择合适的角度和焦点呈现画面的层次及意义。在教材的“二次开发”中，教师应引导学生关注体现共情传播、能产生互动性对话效果的语言现象。

3 教材“二次开发”实践中的三组关系

3.1 兼顾教学的因事为制与知识的完整建构

有学者曾经批评对待教材的两个极端态度：一是神化教材，把教材奉为权威知识载体，把教学变成纯粹知识的传授，屏蔽了其他观点和视角；二是去教材之魅，把教材定位为教学材料、纯粹的教学工具，使其失去权威性（高德胜 2019）。这两种态度都有其认识的局限性。教材的“二次开发”意味着因事为制，需要根据不同的授课对象，对教材进行调整和加工，以增强教材在具体情景中的适用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开发的随意性。《汉英翻译教程》的结构基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的“十个明确”，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法治、外交、军

事等各方面。教师在根据教材设计教学内容时应注意知识讲解的全面性、连贯性和逻辑性。

有的教师会按照自己理解的内容相关性进行选择教学。比如，有的教师认为第十一单元“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外语专业关系密切，会直接讲解这部分内容；有的教师觉得坚持党的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都是关于党的知识，所以把第三单元和第十二单元合二为一。这样厚此薄彼、以偏概全的做法不可取，也与该教材的编写意图不相符。

有教师提出过这样的疑问：既然我们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外译人才，那么经济、文化、外交等才是国外读者关注的话题，军事主题的内容是否不宜作为外宣和外译学习的材料？其实，无论是强军思想，还是其他方面的重要论述，都有必要系统学、合理“进”。随着国际社会对中国方案、中国道路的高度关注，国外不少媒体也在报道中国、讲述中国。如果我们不能率先准确阐释和翻译关键概念，任由外媒去想象、杜撰，那么一些重要概念容易被简单化，甚至庸俗化、污名化。

比如，表2中的“打仗意识”“军事斗争”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被那些视“弱肉强食”军事哲学为圭臬的人误读为中国军队热衷战争，给鼓噪所谓“中国威胁论”的人以口实。在此语境下，“打仗意识”“军事斗争”意指中国军队所坚持的反侵略、反压迫、反颠覆、反霸权的正义战争，“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中共中央宣传部 2016：252）。译文 be ever ready to guard against potential dangers 较准确地反映了“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的本质思想。

“红色”也是一个容易被西方部分媒体误读、误译的概念。“红色江山代代相传是一个政治意蕴和文化意蕴相互交织、相互融合的话语表述，有

着丰富的内涵和意蕴。”（李喆 2020：49）在此语境下，“红色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红色制度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李喆 2020：49）。

表2 军事主题内容在教材中的体现（示例）

原文	译文
全军要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安全和发展大势，强化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打仗意识，扎扎实实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各项工作，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汉英翻译教程》，第176页）	In view of this, all our military personnel must gain a full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underlying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trends, be ever ready to guard against potential dangers , and take solid steps to ensure that we are ready to meet any challenge and fulfill our missions entrusted by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i>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III</i> , p. 454-455)
人民军队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是保卫红色江山、维护民族尊严的坚强柱石，也是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汉英翻译教程》，第169页）	The people's military has made indelible achievements on behalf of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It is a strong pillar for safeguarding our socialist country and preserving national dignity, and it is a powerful force for protecting peace in our region and beyond. （《汉英翻译教程》，第169页）

国际传播包含“破”与“立”两个方面，我们不仅要对外讲好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还要破除错误的言论，为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创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越是对我们有误解和歪曲的地方，越需要我们的声音在场，有针对性地讲述真实立体的中国故事。从知识建构的逻辑来看，习近平强军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国际传播的战略需求来看，有必要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国军队保家卫国、维护领土主权完整、维护世界和平的主张。所以，在教材“二次开发”中，教师应注意教学设计的因事为制与帮助学生建立完整知识体系之间的平衡。

3.2 均衡学科内容与教育维度

教材通常应遵守两个原则：一个是内容原则（内容律），另一个是方法原则（教育律）（高德胜 2018）。在分科教学的客观情形下，教材大多是分科教材，学科分类就是教材分类的重要依据。但“教材所承担的是教育任务，忘记了这一点的教材，无论学科内容多正确，都不是教材，至多是学科内容的汇编”（高德胜 2019：100-101）。

《汉英翻译教程》聚焦中国时政文献的翻译策

略与实践，学科倾向明显。在教材的“二次开发”中，教师要避免教条式教学、就语言谈语言，而应根据学生的认知特点，抓住教材中易触发学生思考、易使讨论“发酵”的优质问题，激发学生自主探索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准确认识和理解新思想的理论体系、实践方略。只有当教材的教育功能得以实现，学生才可能对文本内容及其背后的逻辑与情怀有充分的认同，从而主动去研究新思想的体系脉络，积极地思考如何准确生动地阐释中国故事。

一个典型例子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涵发展及其对翻译产生的影响。2014年1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工作时第一次提出了“四个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际，中国共产党于2020年10月26—29日召开了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新表述，即“协调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对比表3中的两个译文版本，可以发现第一个“全面”的英译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表3 关于“四个全面”表述的英译变化

2020 年 10 月之前, 关于“四个全面”表述的英译	2020 年 10 月之后, 关于“四个全面”表述的英译 ¹
This refers to China's strategic plan for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at is, to make comprehensive moves to complete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to further reform, to advance the rule of law, and to strengthen Party self-governance. [Xi Jinping: <i>The Governance of China</i> III, p. 7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译文)]	The comprehensive strategy in this regard includes four prongs, namely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deepening reform, advancing law-based governance, and strengthening Party self-governance. [<i>Resolut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n the Major Achievements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Party over the Past Century</i>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译文)]

教材一旦付梓出版后难以通过传统方式进行内容更新,但科学的理论不是封闭僵化的,而是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权威文献中出现不同的表述,通常会引起学生的特别关注。教师若能针对学生的兴趣点进行启发式教学、研讨式教学,教材中的这些“非常规问题”就会成为课堂上“发酵”的优质问题。在上述案例中,教师可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多语种数据库综合平台等资源,引导学生在学习翻译技巧的过程中理性反思,认识到国际传播视域下翻译活动的复杂性,认识到科学理论会随着时代、实践和认识的发展而发展,认识到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历史思维对译者的重要性。

3.3 推动“教材”向“学材”创新转化

“教材”和“学材”是两种不同的教材观,前者注重“教教材”,教材等同于教学本身;后者强调“用教材教”,教材是开展教学的手段和载体(李志超 2020)。教师在教材的“二次开发”中可通过整合创新多元化教学资源,推动“教材”向“学材”创新转化,避免将教材囿于扁平化的文本。

首先,教师可根据翻译涉及的知识整合学科视角,让不同学科的专家也成为教材意义建构的重要参与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涵丰富,多领域融会贯通、不同学科专家参与是对翻译专业教师理论知识的完善,也是用好《汉英翻译教程》的宝贵资源。

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态学、经济学、法学等学科领域的专家在术语解读、句子逻辑分析、语篇结构分析等方面可为教材内容提供专业支撑。比

如,《汉英翻译教程》第六章提到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师生在学习这一章时可能存在这样的疑问:英语语料库中 ecological 与 civilization 搭配使用的情况并不多见,不少英语母语者也对此感到陌生,为什么生态文明还要译为 eco-civilization 呢?西方也讲生态保护,和我们有何不同?这个概念的独特性体现在哪里?

在教材试用过程中,编者特意邀请了研究生态银行的专家²答疑解惑: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自然生产力与人类社会生产力和谐统一的思想,将其表述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生态生产力观,辩证看待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把生态环境看作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因素,超越了传统的生产力理论以及西方国民经济学的生产力学说,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由此可见,生态文明这一概念内涵丰富,包括但不限于生态环境保护。在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语境下,eco-civilization 能比较准确地体现生态文明这个术语的内涵和高度。

此外,译者也是重要的意义建构者。译者虽未直接参与教材编写,但从编者对译者的采访可以看出,译者“以我为主、融通中外”的总体思路非常清晰,且贯穿工作始终。在《汉英翻译教程》前两个单元,编者首先从教学角度系统介绍了常见的时政文献外译“工具”,突出语言知识和翻译技巧的应用,可谓“先利其器”。译者若能通过各种渠道参与相关的教学研讨,可启发学生如何“见招拆招”,帮助学生深化对“器”的认识。

¹ 《汉英翻译教程》第 95 页对“四个全面”的英译进行了解释说明。

² 感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崔莉教授对本文的贡献。

其次,教师可合理开发非文本性课程资源,加强教材知识的可感性。“‘学材’观强调将实践活动中的直接经验和书本中的间接经验进行重新整合……把学生间接学到的知识组织到他们已有的经验中去,把学生感到陌生的、不相干的、冷淡的、遥远的和‘抽象’的事物通过交往、组织、沟通整合到学生已有的熟悉的经验中,使学生对于间接经验的掌握内化到直接经验的学习。”(李强、李孟璐 2011: 15-16)在《汉英翻译教程》“二次开发”过程中,有条件的院校可以结合一定形式的情景教学,让学生“通过观察、推理以及问题的产生和解决,更能获取真正有用的知识和生活本领”(浙江行政学院课题组 2008: 48)。比如,在讲到生态文明思想、乡村振兴等内容时,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到特定场景进行调研,赋予学生沉浸式的学习体验,加深其对教材内容的理解。有了身临其境的感受,译者能更加准确地理解、更加生动地阐释中国故事。

4 结语

Baker (2006: 37) 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总是以某种形式参与建构和传播叙事及话语”。虽然对外话语体系建构和传播是一项综合性工程,需要多学科、多领域协同努力,但翻译无疑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基础作用。针对本科英语专业、翻译专业的学生,《汉英翻译教程》应引导其从宏观着眼,认识翻译在国际传播中的战略性意义;从中观着力,培养“以我为主,融通中外”的话语建构意识;从微观着手,学习权威翻译专家团队的集体智慧。既然是针对意识和能力的培养,教师应避免照本宣科式的语言对比分析,在准确把握教材编写意图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好教材“二次开发”的机会,把教材真正转化为联系的、开放的、让教学充满活力的课程资源。

参考文献

- Baker, M. 2006. *Translation and Conflict: A Narrative Account* [M]. Oxon: Routledge.
- China Daily. 2021. Resolut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n the Major Achievements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Party over the Past Century [OL]. http://www.chinadaily.com.cn/a/202111/17/WS61944b49a310cdd39bc75c01_5.html (accessed 30/04/2023).
- Xi Jinping. 2020. *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III*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 高德胜, 2018, 以学习活动为核心建构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J],《中国教育旬刊》(1): 1-8。
- 高德胜, 2019, “文化母乳”: 基础教育教材的功能定位[J],《全球教育展望》(4): 92-104。
- “理解当代中国”系列教材编委会, 2022, 总序[A]. 载张威(编),《理解当代中国·汉英翻译教程》[C].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I-IV。
- 李强、李孟璐, 2011, 变“教材”为“学材”的几个基本问题[J],《教育理论与实践》(29): 15-17。
- 李喆, 2020, 确保红色江山代代相传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路径——基于党内政治文化的视角[J],《党政研究》(1): 48-54。
- 李智, 2014, 再论国际话语权及其提升路径[J],《北大新闻与传播评论》: 199-212。
- 李志超, 2020, 从“教材”到“学材”: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材观研究[J],《课程·教材·教法》(8): 25-31。
- 王云、胡文洁, 2022, 语码转换助推积极交际[N],《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2-8-23。
- 徐勇, 2018, 用中国事实定义中国政治——基于“横向竞争与纵向整合”的分析框架[J],《河南社会科学》(3): 21-27。
- 杨望平, 2018, 以我为主, 兼收并蓄——以党的十九大报告英文翻译为例[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 26-32。
- 俞红珍, 2005, 教材的“二次开发”: 涵义与本质[J],《课程·教材·教法》(12): 9-13。
- 张毓强、潘璟玲, 2021, 国际传播的实践渊源、概念生成和本土化知识构建[J],《新闻界》(12): 41-55。
- 浙江行政学院课题组, 2008, 现场教学法研究[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5): 47-50。
-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 2016,《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C]. 北京: 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

程维,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 翻译理论与实践、跨文化传播。电子邮箱: chengwei@bisu.edu.cn